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40年評析

An Analysis of Chins's 40-Year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姜新立 (Chiang, Hsin-Li)

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壹、前言

到今(2018)年12月，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改革開放」整整經過40個年頭。40年的「改革開放」讓「社會主義中國」改頭換面，甚至使「中國崛起」，對世界第一超強的美國也帶來一定的「威脅」，否則不會有「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也不會有現在正在進行的美「中」貿易大戰。當然，「改革開放」也積累出「中國經驗」，形構成「中國模式」，發展為「中國道路」，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的「國家發展」提供了模式與道路的選擇途徑。然而，「改革開放」也帶給大陸政治、經濟、社會面許多問題，而且問題頗為複雜，不容習近平的中共忽視。

貳、「改革開放」邏輯因由

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共於1950年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這個沒有社會主義經驗的「新中國」由毛澤東主政，採取「俄國道路」，用「馬列主義」(即史達林主義)做思想指導，以「史達林模式」建設「社會主義中國」。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用「人民民主專政」治理，用「三大改造」改變社會所有制，以「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為途徑，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左傾冒險路線下將「社會主義中國」強勢過渡成「共產主義中國」。整個發展看似「超英趕美」，實際是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而將大陸推入「逆退發展」境地，甚至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割除資本主義尾巴」，實行「一大二公」，採取「絕對平均主義」下，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越過社會主義直接進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論」作法最終把整個大陸推到「一窮二白」地步。

毛澤東因「三面紅旗」失敗退入第二線，但為了奪權，他藉「打倒修正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名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是大陸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政治災難，「新中國」被毛澤東推至「亡黨、亡國、亡頭」的危機地步，這種「逆退發展」，連中共自己都說，「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毛澤東最後把這個「新中國」建造成為一個極權主義、教條主義式的封閉型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它既不是《禮運大同篇》中的「大同世界」，也不是《共產黨宣言》裡嚴格意義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比吉拉斯（Milovan Djilas）所描述的「不完美的社會」還不完美。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缺乏「民主」的社會主義不可思議，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反覆強調並出現過。關於毛式共產主義中國，寫《大失敗》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稱它是「極權主義國家」，寫《馬克思主義主流》的柯拉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稱它為「農民烏托邦」，總之它不是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樣的「紅色東方國家」在冷戰時期一直與西方世界敵對著，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也被孤立著、被圍堵著，「社會主義中國」走到這種地步，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改革」是對內進行改變與轉型，「開放」是對外擺脫「孤立」並「與世界接軌」。

參、「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

「改革」為了制止 / 告別「革命」，但大陸「改革開放」卻被中共形容為一場「革命」，並在「國家發展」意義上是繼 1949 年革命之後的「第二次革命」。然在「歷史 / 社會發展」意義上，「改革開放」又被中共稱為「偉大的歷史轉變」。這一場「革命」的性質與內涵以及它的「大轉變」 / 「大轉型」過程，都是朝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前進，它將「社會主義中國」推入「後社會主義中國」，因此當代大陸絕不是「共產主義中國」，西方世界（包括臺灣）都不應再以「冷戰思維」 / 「反共邏輯」對待「改革開放」後的大陸。

「改革開放」這場「革命」的政治工程師是鄧小平，時間起始於 1978 年中共 11 屆 3 中全會，但性質上它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革命，而是一場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目標的在社會主義自身基礎上從思想到制度的全面轉型、自我改造、乃至自我完善的「社會革命」。當時中共中央如此指出：「實現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地革命。」這種「革命」的形式不是突變的，而是漸進式的，是分階段的，也是長期的。在階段上，1978 年—1991 年為「探索」階段；1992 年—2002 年為「初步架構」階段；2003 年—2011 年為「市場經濟初步完善」階段；2011 年—至今為「全面深化、五位一體」階段。從時空概念看，這場「革命」讓中共及大陸 13 億人民由觀念到現實，由內心到外在，由理論到實際，由政策到制度，做「全方位的轉變」，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看到過這種規模與維度的革命性的改革。

或許有人會說，大陸才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為何後文革的鄧小平又要進行另一場「第二次革命」？答案恰如鄧小平所說的：「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可見「改革開放」是在大陸「脫文革」、「去文革」，把一條駛入「左傾」死巷的大船拖拉出來，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右方」活路重新駛航，這對中共乃至對大陸而言是生死攸關，迫不及待。

肆、「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

「改革開放」連思想觀念都進行改革，不同於前蘇聯與前東歐對「共產主義」信仰系統不敢「非意識形態化」。鄧小平首先解放思想，他說「馬克思活在一百多年以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所有問題」。「解放思想」朝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反教條主義」/「非意識形態化」做推移，中共中央鄭重強調：「我們必須離開作為教條主義的列寧式的馬克思主義，剝奪它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真理』的面紗，還馬克思主義以本來面目。」

「解放思想」給「改革開放」解開心理的/觀念的困局，一旦思想解放了，生產力自然解放；如果觀念想通了，一切都可以「改」，萬門都可以「開」，這會對當代大陸轉型與發展產生積極意義。

如何「改革開放」？中共強調態度上要「實事求是」，鄧小平在中共 12 大開幕式上講得很清楚：「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或是建設，都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還有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改革開放」在「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將大陸的社會主義轉型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大陸的發展道路轉變為「中國道路」，將現代化建設打造出「中國模式」，這在比較政治學理論裡已被列為新的知識篇章，同時為發展中國家/地區提供了可以選擇的途徑。

伍、「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最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鏡的是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與「第三條道路」，這個模式既不同於生產資料公有的「共產主義模式」，也不同於生產資料私有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將「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一起的一種「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其實就是一種在社會

所有制改革下的混合經濟 (Mixed Economy)，亦即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經濟學。鄧小平尊敬孫中山，並熟悉民生主義，也看到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 (Market Socialism)，他在「改革開放」中做這樣的經濟轉型其理念與靈感均來自於此。從 2003 年到 2010 年大陸 GDP 以二位數前進，即使今年仍然保持 6.7% 的事實看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證明最具實效，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便沒有大陸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事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十年後，「資本主義」、「市場」、「向錢看」、「商業文化」、「西方價值」瀰漫流行整個中國大陸主要沿海、沿江地區城市，中共黨內激起反對「改革開放」聲浪，有保守教條派老幹部甚至諷刺地說：「辛辛苦苦幾十年，如今又回到解放前！」這些延安時期共產派認為鄧小平這個「走資派」用「改革開放」讓資本主義復辟，中共無產階級工農革命白幹了。

其實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是「用資」，而非「走資」，馬列教條主義者欠缺這種知識認識。鄧小平除了再次強調「計劃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為此 1992 年初他還特別南下深圳、廣州、上海巡視調研「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做了有名的「南巡講話」，強烈批斥反對改革開放的聲音及保守勢力，聲稱要為「改革開放」再進行一次「革命」。

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持續實踐至今，在實效上除了讓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把握下，「經濟改革」有它的理論知識合理性，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市場社會主義」，它的合法性在於它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它的合理性在於如無「市場」提供產品，則「產品價值」無從決定，如無「價值」，「經濟合理性」便不可能。「市場社會主義」是將一個經濟政治系統與商品持續分配的社會經濟所有制透過市場機制連結起來，它是「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的合併，完全是一種新型社會資本所有制。

雖然「改革開放」是全面地進行，所涉領域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甚至心理及思想層面，但屬經濟領域內的「改革」與「開放」改變得最多，成效最大，但也帶來大陸貧富反差極大的社會問題。

陸、「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意義

大陸在「摸著石頭過河」中進行「改革開放」，經驗是在試誤的過程中累積出來的。由於「改革開放」的過程崎嶇，自我完善的時間也較長，甚至直到現在，誠如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對改革開放最好的概念是「更全面、更深刻地推進改革開放」。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地完成，有待繼續走下去。

大陸「改革開放」40 年有無經驗值得重視並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鏡？有，可分「基本經驗」及「新鮮經驗」兩個方面。

它的基本經驗是：一、不斷解放思想，推進理論創新；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能動搖；三、靈活運用改革方法/途徑，先行先試，先易後難，統籌兼顧，協調推進；四、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辯證關係。

它的新鮮經驗是：一、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教條主義，把國家發展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現代化」，把發展生產力，加強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做為高於一切的首要目標；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能用「大躍進」、「速勝論」方式進行，要顧及國情，設定現代化戰略目標，採漸進式方式，分階段（如「先公後私」、「公私並舉」），有步驟（如先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然後在城市通過發展個體經濟、外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國營企業以改變城市經濟）地進行經濟建設；三、不以「單打一」作為現代化目標，採全面性、整體性，領域層次性及中心性（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做到「轉軌而不轉向」，「轉軌而不脫軌」。

「改革開放」對中國大陸而言，其歷史意義首先在於回到「實事求是」和「去階級鬥爭化」的立場上去，對大陸社會主義傳統體制弊端深刻反思，牢牢把握「現代化」之路的方向，抓住不容錯過的歷史性戰略機遇，讓封閉的大陸透過「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在全球化下重新定位大陸。其次，「改革開放」的實質意義是大陸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制度保證，以「改革開放」做根本途徑。其三，在轉型意義上，「改革開放」標誌著大陸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真正轉型，衝破傳統馬列主義單一國家或集體所有的公有制的正統性，向社會主義公有

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新型所有制做轉型。如果說前蘇聯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死路」，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活路」。前蘇聯的「死路」是指延續 60 年的「史達林模式」向戈巴契夫 (Mikhail S. Gorbachev) 的「新思維」(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休克療法) 做快速改變，這是由「極左」向「極右」急轉，必然產生「本體論的斷裂」；大陸的「活路」是指由「毛澤東模式」(「價值取向的自力更生模式」) 向以「改革開放」為特點的「鄧小平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誤法/「利益取向的現實主義模式」) 轉進，這是在「反『左』」又「防右」的前提下由「極左」向「偏右」緩移。其四，在政治意義上，「改革開放」促使中共由「共產極權」向「後共產威權」做轉型，這在政治國家上表現為國家功能的轉化，鬆動「一黨專政」，強調「依法治國」，政權對治權的逐漸監督。其五，在社會意義上，「改革開放」讓一個一元的、封閉型的共產社會向二元的、半開放型的社會主義社會做轉化。其六，在理論意義上，「改革開放」讓權威性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面臨知識危機。「改革開放」將大陸推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資本主義補課」方式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讓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路徑與馬克思晚年所說的「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相矛盾。

柒、問題與展望

習近平在中共 19 大上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並對「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 14 條基本方略，其中第 3 條即「堅持全面深化改革」。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習近平將「國家發展」與「改革開放」結合在一起，換句話說，不論「改革」或是「開放」，都是為了國家「發展」，而不是讓國家停滯，更不是使國家倒退。

習近平將「國家發展」總目標設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為兩個階段實踐：2020 年—2035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35 年—2050 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其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

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要走完這兩大階段，實現這兩大目標，完成這「五位一體」，勢必要繼續並深化改革開放不可。

19 大前大陸已基本完成經濟改革與建設；19 大後，習近平說深化改革的重點在於「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吸收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且強調「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可見等待習近平用「改革」與「開放」為槓桿要解決的問題頗多，阻力不小，有待他努力的勁道也頗大。目前習近平所說/所做的「從嚴治黨」、「依法治國」、「反腐肅貪」、「破除體制機制弊端」等等還是「政治體制」上的改革面向，離「政治改革」還有一段距離。

馬克思說「下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性地影響「上層建築」(政治、法律、文化、意識形態)，大陸在經濟改革/建設的基礎完成上，必然決定性地影響政治改革/建設及其他「上層建築」的改革/建設，但「深化改革」的下一步其實應該是要由「政治體制」改革向「政治改革」繼續邁進為優先，這樣的「改革開放」才算深化。